

2046/28

前 言

我们选编的《文史资料选刊》，已经印行两期了。由于《选刊》的内容体现了地方特色，着重介绍了我区的历史古迹，人物史话，工商老字号等，对于了解本区的历史掌故，增长知识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同时作者也大多是本区的，使读者有亲切之感，因而受到了我区读者的欢迎。为此，鼓励我们要继续努力把《选刊》办下去。现在第三期又和读者见面了。

《七百年来的崇文门》一文，结合北京建城的历史，以崇文门为重点，写出了城址的变迁，城门名称的更换，以及遗闻轶事，景物风情等，使我们加深了对崇文区历史风貌的了解。如今崇文门虽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已被拆除，但因之而得名的“崇文区”将永远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值得我区人民一读。《清末以来的北京玉器业》，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北京玉器业生产销售的历史情况和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字号、人物及有关轶事。我区是玉器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篇文章对研究玉器业的特点和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北京南药王庙考略》一文，对我区文物暂保单位“药王庙”的建庙历史和变迁做了不少考证，对该庙的建筑和诸神像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记述，使我们今天得以一窥旧貌。

在这一期中，从市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编》中，选载了由我区政协供稿的，我国著名书法家肖劳老人的回忆录一篇，这篇回忆录记述了作者在北大读书时的生活片断，反映了蔡元培、陈独秀等几位名人学者的一些轶事，读者可从中得到若干启示。

在这一期中，还选登了《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的四篇文章，题目是：《通三益及其著名的秋梨膏》、《正明斋饽饽铺》、《便宜坊的焖炉烤鸭》和《老二西堂二三事》。这四家老字号都是在崇文区的，对于它们的历史和生产经营特点，作者都经过了广泛深入地调查，力求全面翔实，是可贵的史料。此外，还从即将出版的《北京谈往录》中，选出由我区政协供稿的《东晓市漫笔》、《老北京挂货铺》、《谈小店》三篇文章。

“东晓市”做为旧北京的一个奇特市场，已经消失了，做为晓市交易的支柱——“打鼓儿的”也不复存在，与之有关联的“挂货铺”也为委托商店所取代。今天重温“晓市”的历史旧貌，使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旧社会的腐朽和黑暗。《谈小店》一文，真实地再现了旧社会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人民住小店的悲惨情景。通过这些史料，可以了解我区曾称为“穷区”的历史事实。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本期选刊在内容和文字上定有许多不妥之处，希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崇文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6年8月

史料选

第 三 期

- 七百年来的崇文门.....沈信夫
清末以来的北京玉器业（上）.....高忠 王明石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回忆.....肖 芳
崇文区知名老字号（三篇）.....王永燮
老二酉堂二三事.....陈德光 张益寿
北京南药王庙考略.....刘殿凯
东晓市漫笔.....陈德光 高凤山
谈小店.....高凤山
老北京的挂货铺.....
艺坛沧桑话今昔（下）.....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七百年来的崇文门

沈 信 夫

北京市四大城区之一的崇文区，无疑是由崇文门而得名。崇文门原为元大都（元朝首都）的十一个城门之一，位于南城三个门的东边，名文明门。明朝改建北京城，将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的方位虽然未动，但改名为崇文门。清朝沿用此名，直到今天，已经七百一十年了。其中城址的变迁，城门名称的更换，以及逸闻轶事的流传等，作为我区历史掌故，殊有记载的必要。

北京成为历代的正式首都，是从元朝开始，定名大都，建筑始于公元1267年（元至元四年）完成于1276年（至元十三年）整整十个年头。城是用土夯成的（古代叫“版筑”）下宽上窄，巍然屹立。四周开十一个门，城内有皇家宫殿，街道房屋。因为是用土夯成的，于是产生了防止雨水冲刷城土的问题，后来用千户（官名）王庆瑞建议，“以苇排编，自下彻上”，就是用苇帘子由下往上覆盖，象人穿蓑衣一样，简称“苇城”或“蓑城”，并在文明门外设立了收苇场。《析津志》载：每年都要“收苇以蓑城”，达“百万”（担）之多。今天崇文区内的草厂头条到十条，南、北、中芦草园（原名芦苇园）等地名，都与元朝的收苇场有关。后来由于元朝最高统治者内忧，守城的一方恐怕对方用火攻，乃撤去苇帘。

元大都为什么要开十一个门？南三、北二、东西各三，正史上没有解释。元末明初写成的《农田余话》（著者不详）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叱三头、六臂、两足”的形状。稍后的明人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叱城”。似此，十一门是采用传说中哪叱形象的象征了。南城三门是“三头”，北城二门是“双足”，东西各三是“六臂”。“憧憧十一门，车马如云烟”（元乃贤著《金台集》），大都是非常热闹的。至于它的设计者“刘太保”就是刘秉忠。刘当过和尚，法号子聪，做官后改名刘秉忠。当时元朝统治者相信佛教，刘秉忠由一个海云和尚的介绍，见到了还未继承皇位的忽必烈，刘跟着忽必烈打云南、伐南宋，但忽必烈的重视。忽必烈夺得皇位后，封刘为太保，参与国家大事。刘秉忠虽是佛教徒，也精心研究道家学说，对于《易经》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宋代邵雍《经世一》中的“先天象数”，都津津乐道。建筑大都城时，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尤其在规划设计方面。所以他为了迎合元朝最高统治者“偶运部长”的狂妄、迷信心理，为了发挥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了愚弄、麻痹和剥削人民，从城门数目的设计上，来宣扬渺无根据的修道佛教，是完全可能的。

大都城南边有三个门，中叫丽正门，西叫顺承门，东叫文明门（即今天的崇文门）。文明门在当时又叫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说：“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哈达”又讹传谐音为“哈大”、“哈德”，

7c46/28

直至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在元朝，哈达门这种称呼，已超过了文明门，一些知识分子在写作时，认为“哈达”、“哈大”不够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谐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门在南城东端的地理位置，写为“海岱门”。明朝人蒋一葵写的《长安客话》说：

“今京师（指明朝北京）人呼崇文门为海岱，……皆元之旧名，相沿数百年，竟不能改”。在名称的意义上，他认为“泰山、渤海俱都城东尽境，元时以‘海岱’名门取此。”渤海即东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大诗人杜甫《望嶽》就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诗句，这两个地位都在东方，用来借代文明门是合理的。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统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如明人卓明卿《登崇文楼》诗：“城头初夜净氛埃，海岱分明望眼开。紫气半空时入座，秋声万里此登台。……”登上海岱门，秋高气爽，紫气东来，眼开万里，何等雄壮！清人著的《白华堂诗录》：“海岱瞻门高，风尘苦身贱。”以自己的“身贱”，衬托，歌颂海岱门高。因而从元到清不断有达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门一带。如《宸垣识略》载“元朝侍御史王俨在文明门（崇文门）外东南里许，筑有别墅，‘园池构筑，甲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华亭，尤为出众。当时人许有壬记云：登上此亭‘北瞻闾阖（街道房屋），五云杳霭；西望轴轳（指通惠河上船只），汎汎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可见当时文明门附近的胜况。清人朱一新考证，水木清华亭‘当与今花儿市大街相近。’又如死后被赐谥为‘文正’的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的刘统勋（按：清朝的谥法，‘文正’最难，最少），雍正帝赐他的诗是‘海岱高门第’，意思说刘是住在海岱门（崇文门）的一户高贵人家。《水曹清暇录》又记有名书法家张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门外，‘屋宇宏深，有楠木厅’极为讲究。不过，清朝时代的崇文门，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北平府最近端，而是变成往南推移后的北京内城了。

经过是这样的：明朝灭亡元朝之后，建都南京，把大都改为北平府，又认为大都的面积太大，命令大将军徐达，铲去东、西城墙的一部分和北城墙全部，使之由周围六十里缩为四十里，并在土城表面包上城砖，把十一门减成九门。今天德胜、安定门外的土堆，就是元大都城的旧址。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孙子建文皇帝。原来封在北平府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赶走了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年号永乐，决定把首都由南京迁到北平府，改北平府为北京。从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起，到1420年（永乐十八年）止，在徐达改建的基础上，又一次较大规模地改建了北京城。第一，把南城城址向南伸展了0.8公里。原来大都南城城址，在今天安门广场北段，南移后成为现在的样子。第二，在南展的同时，也往东移0.4公里左右。这在公私文献中均无记载。清同治间人杨静山《燕墩》诗云：“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卓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燕墩在今永定门外大街路西，旧名沙子口，墩上有清乾隆立的石碑。元朝丽正门即明、清的正阳门，俗称前门，与永定门同在北京城中轴线上。元代时燕墩既然正对丽正门，而今燕墩在永定门偏西，是北京城往东移了。文献无征，所以杨静山说：“大都旧事谁能说”得清楚呢，第三，规定城墙下基厚六丈二尺，上顶收缩成五丈，略呈梯形。每行砖与每行砖之间，往上砌时稍凹进，以资稳固。第四，重新制定、公布九个城门名称，丽正、文明二门当时未改；过了二十年，在英宗朱祁镇正统初，改

丽正为正阳门，文明为崇文门。

到了公元1509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计划在整个北京城外，再建筑一道外城，结果困于财力物力，只在南城外筑成一条东西狭长的城墙，就是今天的东起广渠门西到广宁门的外城，又叫罗城。这样一来，昔日北京城最南面的崇文门，就成为内城。街道商店，住户人物，出入此门的官吏商人，日益增多。清朝入关以后，在城建上沿袭明制。它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明史玄《旧京遗事》)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入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绫绸缎布等”。“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甚至“虽无货亦征之矣”。关吏“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以上均见《天咫偶闻》)。清朝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陞见，关吏(指崇文门税局)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小贩，也须排队等候。天长日久，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琛曾有一首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这钱即归关吏私有。崇文门税局收入甚多，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献鲜”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变相的分赃。当时又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崇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酿酒小作坊，为了维持生计，避交高税，于是有“揩私酒”的情况出现。揩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们白天选择好一段城墙，夜晚暗中训练。揩时，把酒装在猪尿泡内，挂在胸前，夜静更深，来到城墙外面，然后用脊背贴着城墙，用双足跟和双手掌跟，紧跟着每行城砖微凸出的地方，一块一块，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绳子把身体系下去。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剥削，逼着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谋取生活道路，所以当时称崇文税局是“鬼门关”。

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莹，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明人董道有《夏日出崇文门》诗：“文明城外柳阴阴，百啭黄鹂送好音。行过御沟(护城河)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过桥不远为花儿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珠，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天咫偶闻》)。沿护城河往东，为太平宫，俗称蟠桃宫，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从，联镳飞鞚，游览于此”，“人眠芳草地”“箭洒(投壶游戏)绿杨坡”(清初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清末人震钧也说：“太平宫庙市最盛”，“地近河坝(护城河边)，了无市声，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曳春风，凡三里许”。冬天护城河上又是一番风景：“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铜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积雪残云，景更如画。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都人于各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连接一处，治酌陈肴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

清末以来的北京玉器业

高 忠 王明石

玉器，顾名思义，即玉石创制的器物、器皿等。它是中国工艺美术中与石器同始的行业。万千年来，绵亘不断，古老而又常新。品类繁多，古朴高雅，晶莹瑰丽，作工精湛，尤以玉石珍贵，常有非金银不可比者。所以为人誉称为“东方之瑰宝”。

北京玉器始于何时？从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穴居处出土的玉石珠、环等饰品看，它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北京玉器，属于北方玉系，大凡河北平山，满城等地出土器物，均与北京玉器有着深切关系。

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则集中国玉器之精华于北京，由是进步极为迅速。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六十年代。

本文为笔者记忆之所能及可能搜集的资料，汇编成文，用记近半个多世纪来北京玉器其人其事，并给读者诸君。

行业的划分

在1930年以前，除玉器业的经营者大部是玉行同业协会的会员，会址设在和平门外的玉行长春会馆内，在这一行业中回族人士占有一部成员，由于在各个节日的庆祝仪式上，回民与汉族有所差异以及业务方面出现矛盾，于1930年回族的同行业者成立了“燕宝玉石同业公会”，会址设在廊房二条，推选万聚源经理马少宸为第一任会长，自此玉

便捷如飞，较之坐骑乘车，胜胜多矣”（《帝京岁时纪胜》）。后来护城河水日渐淤塞，清政府及民国军阀又不加修浚，往日胜景，一去不反。崇文门到蟠桃宫，则改为骑驴；驴识道，不乱走，不用人牵，到目的地自有骑行人接去，绝无差误。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崇文门亦在改造之列。今天的崇文门城墙已经拆除，护城河水改为暗沟流通，沿着城墙遗址，地面上铺成宽阔清静的柏油马路，车马行人，昼夜不息；马路两旁，高楼林立，锦绣翠幕中住着万户人家。地下就有环城铁路，四通八达，电掣风驰，每天吞吐着几十万人次。不但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无法相比，即使是在明、清最盛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随着今天城市经济改革的进行，崇文区发展前途，正为崇文门，而崇文门的悠久历史、遗迹佚事，也将永远流传，成为北京市的一段佳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修订

器行业遂有两个公会组织，一为汉族的“玉行同业公会”一为回族的“珠宝玉石同业公会”。

在这一行业中总的说来虽仅有工业与商业之分，但在经营品种与方式上，却种类繁多。按照所经营的“庄口”（销售对象）可分为：

蒙 藏 庄

用松石、珊瑚、青玉为原料所磨制的头饰品、腰饰品、带饰品如元子儿，便子儿，三宝、五宝、方子以及各种原料的烟嘴、烟壶等，是以蒙藏少数民族为销售对象的，所以称之为“蒙藏庄”。经营者除仰仗门市销售外，或亲赴外蒙、西藏、青海或到外馆（专营蒙藏民族货品驿道式的贸易货栈）进行交易，常以物资交换形式换取对方牛、羊、马牲畜、皮毛、药材等，此类商品制作简单，生产过程短，资金周转快，商品价格高，加以换取对方物资，进销均获利润，故店铺皆极殷实，如开设在廊房二条的三盛兴，恒盛兴，廊房三条的全兴盛，雍和宫大街的隆恒斋，都是经营“蒙藏庄”较为称著的店铺，在行业中也称之为“珊瑚庄”，或名“红活行”。

“本庄”或称为“中国庄”

在对外贸易未兴盛之前，珠宝玉器的销售主要是内销，“本庄”或“中国庄”这一名称是在逐渐开展了外销以后与“洋庄”货品有所区别才形成的，是以每个历史时期的官宦、军阀、官僚，富绅，贵族妇女为销售对象，诸如官宦所需的翎管、扳指、朝珠、顶珠、帽正、带钩、带扣、烟嘴、烟壶、图章、别子、九件等等，供妇女妆饰的各类宝石、珠钻、翡翠、碧玺等的戒面、戒指、耳环、坠子、三套环、腕簪等等。如开设在廊房二条的聚丰厚、宝权号、聚源楼、廊房头条的馥宝斋、义文斋，崇文区花市四条的聚昌源，都是清末民初经营珠宝，翠钻著名的店铺。

“洋 庄”

它的兴起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凡适销于国外的各类品种的首饰，花片、摆件统称为“洋庄”货，它又分为：南洋庄、法国庄、美国庄和日本庄，法国庄与南洋庄的商品摆件以体大做工粗，价格较低为特点，美国庄和日本庄则以精美为主，尤以日本庄不拘是饰品还是摆件，在原材料的质色上与造型花纹方面，均要求精美细致，为“洋庄”货中最为精尖的商品，下列开设在廊房二条的几家商号，各个具有其特点，有的是亦工亦商，有的是只商不工，有的虽是商而不工却自购原料交与加工作坊代为制作商品，还有由工转变到以商为主，本庄洋庄兼营的：

富德润 经理常星垣，回族，为光绪后期至三十年代中期经营洋庄摆件较为著名的店铺，设有磨玉作坊，工人达百十余人，同时还发外加工制作商品，其产品特点是大而粗糙，适合法国和南洋庄口。

三义兴 经理沙云五，回族，出师于富德润，专营玉器摆件，没有作坊但自购翠、玉原料交与著名的加工作坊义珍荣，宝珍斋等为其制做商品。

德源兴 经理铁宝亭，回族，为近代我国珠宝玉器业经营商品最为广泛者，有“翡翠

大王”及“铁百万”之称号，在品种方面几乎是无所不备，无货不臻，既经营“本庄”又经营“洋庄”，在珠宝玉石业中，执全国之牛耳，虽不设工厂却购买高级翠、玉加工制作摆件，当时有名的加工作坊宝珍斋，义珍荣为其加工磨制的摆件皆为精尖之品，由于资金雄厚又克勤克俭，在进货中，内外行的高档货品凡为其所看中的大部均收购到手，日伪统治时期，在上海与当地著名珠宝商翡翠公司经理马晋卿两家合伙以七万四千元购得重二百四十斤玻璃水地带高绿线翡翠原料一块，铡开后，质地滋润，水份足透明度大，绿色鲜阳，且绿线深宽，有绿部份面积大，能够磨制出的戒面宝，马蹬戒指，尖石甚多，最精美的成对戒面宝售价二十条黄金之巨，地子部份则制作了洋庄摆件，似此集质地之滋润，水分之充足，绿色之鲜阳于一身的翡翠实属罕见，曾轰动一时，行业中称之为“七四”或“七万四”翡翠。据笔者采访当年在其商店的职工略举了铁氏所存有的几件珍品如：一只全部呈高艳绿的文搬指装置于磨制花纹并刻有清代宗室载铨的堂号“行有恒堂”字款的白玉套盒，此物铁氏曾售与日本商人后又由日本买回做为非卖品收藏。素高蓝宝石带头一只，重有数两，被称为宝石王，亦为非卖品之一，约八分长子母绿宝石坠子一对，堪称绝品。一寸长的瑰紫六道线大戒面宝（用坠子磨改的，磨改人为廊房三条个体劳动者冯益三），又绿又黄又黑的猫眼大戒面，质地润，黑似铁白似雪红似血的鸡血图章，成对宋君窑花盆，乾隆茶叶末瓷瓶等皆为民间罕见之品。在销售方面，价格不达其所意欲绝不出售。顾维钧，孔祥熙，宋子文，于凤至，白崇禧，马鸿逵，周佛海等都是他的“本庄”货用户。最早来我国采购古玩玉器的日本山中商会及日商田中，扶田，更爱等是他“洋庄”货的买主。

永宝斋 经理常子萱，回族，民初仅为自产自销的作坊，后始由旧址炭儿胡同迁至廊房二条开设门市，向珠宝翠钻发展而重商轻工，业务日趋发达，是为既搞洋庄又做本庄，亦工亦商的典型。

荣兴斋 经理梁友麟，回族，本人具有制做仿出土古玉（如琥、璜、珑、璧等）的技术，其产品可乱真，在行业中之为“梁货”，这种产品的原料仅为玉石作坊所抛弃的带有石质等瑕疵不洁的白玉，青玉等下脚料，成本颇低，制成产品后，以真正古玉面目出售，价格极高，获利甚厚。梁有三子，各具所长，发展甚速，为经营高档洋庄，本庄珠宝玉器、古磁著名的商号之一。

利贞祥 经理杜玉林，翡翠等饰品有的是以原料磨制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旧货（烟嘴、扳指等）改制而成的。磨改这种旧货使之成为适合时代易于销售的戒面，鸡心等饰品必需具有相当鉴别和取材技能，如果经验不足，取材技能不佳，同样一件旧货在质与量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则差距甚大。杜氏既有鉴定色与质的能力，又富有取材的技能，是为日伪时期至解放期间磨改旧翠货的佼佼者。

开设在王府井大街的宝润成及崇文区雷家胡同的个体户金德山（回族）（在国外被称之为TIFFANY）是专门经营洋庄首饰的商店，这类饰品不仅在饰品主体原料上有所不同，特别表现在镶工的样式和方法上，它用松石、珊瑚、紫晶、玛瑙、芙蓉石、老虎石等原料磨成饰品的主体，镶银质、铜质等各种形状的胎托成为别针，项链、耳坠、戒指、手镯等别具一格的饰品。这种镶嵌式样来源于蒙藏庄而又加以发展改进，形成为

专门适合于国外销路的洋庄饰品，是这一行业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在镶嵌方法形样上可分为：实镶、鑲镶、花丝镶（平丝、花丝、堆丝）和实镶加花丝等。

个体经营户的杰出者

有不少没有店铺字号只以个人姓氏经营业务的个体户，在这些人中有很多具有各个不同的专业独特技能，在行业中享有极高声誉的人，略举二三如下：

穆祥振 回族，玉器制品虽价值万千，但在制做过程中，甚至琢磨多年将近完工时，常因不慎使产品损毁，例如器皿之类的瓶、炉、薰、盅、盘、碗等在串膛磨薄的工序中，由于种种原因出现磨漏出洞，练子折断，花卉人物鸟兽的折枝断梗，掉腿失指等事故，致使产品价值锐减或全部失去价值，穆氏却能以其独具的卓越技艺，使洞孔修补完整，枝叶花朵恢复原状，练子连结如故，不仅丝毫不露痕迹而且虽经高温水煮，绝不掉落，昔年宝珍斋为济兴成加工制做一件青白玉薄胎大瓶，已近完工，并以万元高价售与上海古董商叶叔重，不幸在串膛时在瓶的肩膀上串漏一个芸豆大小的空洞，后求请穆氏修补完好，真是天衣无缝。又某商号有碧玉牛一件，在制做过程中，把牛的后腿由大胯处折掉，穆氏却借此把牛体内部全部挖空，以其特技将牛后腿安置密合，丝毫不露痕迹，又经著名玉师潘秉恒加以琢磨全身牛毛，精美绝伦，反使该物价值倍增。诸如此类情况甚多，仅举此一二例。凡同行至友有所恳求，皆无代价为之，只要索原产品下脚料一块以作修补之用。由于具有这种特技，所以昔年与潘氏合作时，专门制做薄胎器皿，其薄度可见指纹，颇具声望。当年尚无“万能胶”，“502”等粘合剂，究属如何修补，无人确知，惜穆氏已故，未传之于后。

戎其五 翡翠是制做饰品和玉器的主要高级原料之一，仅在制做饰品方面来讲，不同于改制旧货，原料不象旧货在质、色、量方面已较为明显的揭示出来，当一块翡翠璞石在未锯开之前，具有各种不同的外皮，购买翠料时只能凭藉着原料某一处或几处所开的“门子”来进行分析研究它内部质量好坏与绿色的多寡和颜色的优劣，即所谓“隔皮断瓢”，以便决定付出多少代价来购买它。卖方是“漫天要价”的，但买方却不能“就地还钱”。而要给以恰如其份的价钱，出价过小则失去机会而被他人购去，相反，出价过高，则亏本赔钱甚至倾家荡产，所以这是一种高度的专业技能，用行业术语来形容时称为某某的“眼睛”如何。这种技能的由来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积累这样一种经验，既需要漫长的时间，又需要雄厚的资金，因为不可能仅仅锯过四五块同一“坑口”或几块相同情况外皮的翡翠璞石，从而就对此类翠原石得出绝对好或坏的经验结论的。翡翠的“坑口”不一，外皮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不是短时间所能取得的经验。搞这种专业的人以相当大的代价买进几斤至几百斤一块翠璞石，锯开后，符合他们对它的鉴别设想，能得到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如出现相反情况，不符合当初对它的设想，也就是质地不佳，颜色不正，有绿色的部份太少，以致赔了大钱。无论是看对了或看错了，他们都要加以研究，以取得经验。在成功，失败的反覆过程中，总结了对翡翠原石上的各种经验，这就不是短时期和少数资金所能换取来的，具备这种技能的在南方上海，云南广东较北方为多，戎其五是北方颇为出色的。

李信宸（回族）。珠宝玉器的品种繁多，在珠宝方面有珍珠、钻石、各色宝石，高绿、猫眼、碧玺等等。玉器除有各种原料与品种的分别外，尚有年份的不同，可分为：新件（近代制品），旧件（清代以上的），旧玉（出土制品），做为这一行业的商家，如能精通其中二三种已是比较难得的人才，李氏不仅在鉴别珠宝品种的真假与优劣具有较高能力，并对玉器旧件，旧玉古磁器的知识也有极高的造诣，因此有很多店铺遇到对某种货品的优劣，真伪有所疑虑时，则向其请教或与其伙同购买。在技能方面受其教导者颇不乏人，是清末至四十年代期间，为此行业对珠宝玉器古磁具有很高鉴别能力者，为同业者所崇敬。

常杰臣，回族，“六道线”是指在红兰宝石戒面上呈现出如星星般的六道明亮的线状闪光而得名，国外称为“星星宝石”。红兰宝石在本庄内销中不讲带六道线，但在洋庄外销中，相同色质大小的同一宝石，带“线”比素的，不仅适销，价值也要高出几倍，带线的宝石戒面绝大多数是由旧货改制磨成的，旧货都没有六道线呈现在表面上，但确有很大部份是可以把“线”磨制出来的，这就需要对其性质特点有所认识，什么样性质的可以磨出，什么性质的不能，如何看，如何磨是要有一定的技艺的，常氏对此有深刻的研究和指导磨制的能力，在行业中是不多的人才。

工业的划分

按其所制做的原料各异与产品的不同，可分为下列两类：

一、按所制做的原料可分为：

红货（活）作坊：以磨制珊瑚元子儿、三宝五宝等蒙藏庄饰品及制做较小的玉制品如扁簪、烟嘴、烟壶、坠子、别子、镯子的作坊，这些作坊和独立生产者，大部仅为商业的珊瑚庄承做加工，如清末至二十年代开设在西四皇城根小红锣厂的荆宝斋，业主吴梦麟。近代著名玉器艺术家潘秉恒就是在这个作坊学徒的。

绿货（活）作坊：专门磨制翡翠饰品各种宝石的作坊。有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一是自产自销，一是只承做加工的个体劳动者，大部份是以改制旧货为主，把购来的或商家委托的各类旧货，取其精美有绿部份改制成适销的饰品，也有购买翡翠原料分解取材制作的，前一种较多，后一种较少，原因在于以原料磨制不仅须有鉴别原料好坏的专门技能而且冒有赔钱折本的风险，原料来源也不如旧货充裕。二十年代以来本市较有声望的自产自销的作坊如设在崇文区上四条的玉强号，经理刘玉强，专门以翡翠原料为主制做素活饰品，在业务上经常与个体商家北方鉴别翡翠专家戎其五合伙，在经济与技术互相协作，有工人十余人。

聚古斋，张姓，开设在花市上四条，以磨制翡翠花片，花坠为主，素活居次，为适合日本庄的高档饰品。

仁聚兴 经理张栋臣，作坊在前门廊房三条，有工人十余位，以专门改制旧货称著，不仅对于“绿货”具有高水平的鉴别与磨改技能，也善于磨改红兰宝石，其主要技能在于对每件旧货能看出它在加工以后的发展程度，在设计磨制过程中，在保证制品精美的条件下，保证最大限度的体积，而多出产品，在二十年代颇具声望，利贞斋经理杜玉

林是他的得意弟子。

旧货品来源于“用户”、商家和个体商业经营者，翡翠原料则仰仗久居北京崇文区长巷二条的“南京帮”商人速仁卿，禹文奎，井昆泉，上海原料商罗子嘉，云南腾冲王少岳等，他们由上海、广东、云南等地贩来售与北京各工商业户。

玛瑙作坊：

天增盛与天德盛，李氏弟兄所经营，各有技工十余人，产品的特点是用产于赤峰，库伦的白色大块玛瑙制做薄胎的瓶、炉、盘、壶等案活，体积大，胎子薄，表面琢磨极为均匀的棱道或菊花瓣，原料色质白润无杂色，具有独特风格，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关闭，技艺失传，产品极少得见。

春盛兴，经理王连贵，专门以锦州黑山所产的玛瑙琢磨带有黄色玛瑙皮俏色的各种花瓶、花罐，这种玛瑙皮的颜色好象黄色水锈，因此称之为水锈皮玛瑙。兴旺时期在1930年至37年，有技工十余人，后受战争影响而歇业，这种产品也随之不见了。

德丰号 经理苗德馨，许占鳌，开设在崇文区中头条，专门制做红色玛瑙的花片和小型摆件，三十年代兴旺时期有工人四十余人，至四十年代后期走向衰落。

德利斋 董凤鸣，二十年代开设在廊房三条，有工人二十余位，专门制作玛瑙烟壶，董氏对制做烟壶内膛有其独到的精湛技艺，他用自己特制工具“弯子”把实体的烟壶掏出膛子来，术语谓之“掏膛儿”。可使用沉重的玛瑙所制的烟壶，经过他灵巧耐心细致的“掏膛儿”技术，做成胎子极薄而均匀的内膛，其薄度使烟壶放在水中浮于水面而不下沉，并在膛内抛光称之为“内亮”，使壶内所装的鼻烟倒出后不挂烟丝。这种轻薄的烟壶，行业中称之为“水上漂”。

岫玉作坊：岫玉分新岫玉和老岫玉两种，这里指的是专门制做新岫玉的作坊。新岫玉产于我国辽宁的岫岩县，是一种低档原料，用以制做各种洋庄摆件，在国外有很大的销售市场，由于价低质软易于琢磨，故为一般资金薄弱的作坊和独立劳动者的主要原料，在崇文区花市羊市口附近一带，这类专做岫玉的小生产者甚多。

松石作坊：松石产于湖北郧阳、郧西、竹山，陕西白河等县，其中以郧阳云盖寺产的质量最高，它的品种以产地命名，郧阳县鲍峡云盖寺赵家场所产的“云盖寺”色泽鲜艳如“雨过天晴”是为松石中的上品，距云盖寺三百余里的竹山县得胜堡金莲洞所产的“金莲洞”料质坚硬，色呈青豆绿色，多“子儿料”，块均匀，内多素少黑线，曾与“云盖寺”齐名一时，并曾为贡品。松石制品以蒙藏少数民族为主要对象，后则成为洋庄饰品主要原料之一，清末以来经营松石闻名的如王云开设的源盛斋，雷文明开设的荣和信均为专门制作松石饰品的作坊，用松石磨制人物，花卉等洋庄摆件首创于雷文明，此类产品颇受国外市场所欢迎。1956年荣和信进入公私合营玉器厂。

玉器作坊：以白玉、碧玉、翡翠、珊瑚、芙蓉石等为主要原料制做摆件的作坊，这类作坊有两种不同类型：

- 1、专门做加工的作坊。作坊主具有设计才能和制做技术，拥有技工，自己不购买原料磨制商品，仅接受商人或自产自销作坊的原料为之制成成品或半成品的作坊，清末以来负有声誉的如：

义珍荣 李耀，有技工一百五十余人，李氏设计能力高超，制作品种较为全面，尤善于花卉制品，为民初至三十年代最大的加工作坊，主要加工对象为上海玉商马功甫、刘宝庆、北京玉商三义兴沙云五、富德润常星垣等，最初设立在前门羊肉胡同，几经迁移，后在四十年代初于和平门新华街结束经营。

宝珍斋，刘启珍，回族，以制作素活瓶、薰大型摆件称著，更擅长设计磨制带有练子的产品，长期为铁宝亭，沙云五，常星垣，高济川承做高级原料大型摆件，有技工一百数十人，为清末以来有名的玉器加工作坊，至1956年公私合营时仅有工人十人左右，刘氏被安排为公私合营北京玉器厂技术顾问。

玉器业鼎盛时期，专门加工作坊甚多如义珍斋王和，瑞成斋王密，松宝斋孟子珍，以及孟鉴堂、郑士繁等都是清末民初至三十年代以制做大型素活，花卉称著者，在技术艺术方面各有千秋。

这类加工作坊在工序方面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能制作产品一部份的，在玉器摆件中占重要地位的炉、瓶、薰、卣等素活，在制作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由原料开始把产品的造型磨制出来，叫做“出坯子”，一是在琢磨完成的坯子上去磨制各种形状的兽头，花头、兽盖、花盖以及身上的各种花纹，直到除光亮工序以外全部完工为止，这道工序称之为“啃头”、“上花”。任何一件产品给人以初步观感印象的首先是造型，如果造型不美，花纹再好也是徒然，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而且这道工序还包括着用料取材和节约原料的专业性技术能力，所以“出坯子”在素活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道工序，民初以来仅能出坯的加工作坊如王坤开设的聚宝斋，赵德一开设的玉聚盛，他们都是初学于三聚成的，对素活的用料，造型皆有一定的设计能力。一种是光亮作坊，“光亮”是玉器制品最后一道工序，产品经过“水椪”（以各种工具用金钢砂加水把原料琢磨成产品，不经抛光，称为水椪）。琢磨成形，不经过抛光而不能将玉的质地美晶莹滋润全部发挥出来。最后完工成为成品。水椪的加工作坊以及小型的自产自销或个体生产者皆不设这道工序，因此“光亮”在这一行业中是单独一种加工作坊。现保存在颐和园内以“三十二万”翡翠制做的大插屏就是由设在羊肉胡同的松竹斋光作（业主虞茂林）由光亮技工杨长顺、王学敏、夏瑞龄，宋义、徐发强等于1928年抛光而成的。1937年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的翡翠大宝塔则是经曹金鳌在廊房二条开设的永元斋光作由技工张其春、张启魁、郝义等许多光亮技工抛光完工的。

2、自产自销的作坊：

清末民初最负盛名的是瑞兴斋，经理李庆林，回族，光绪年开设在前门外门框胡同，仅仅是一间门脸的小作坊，“洋庄”兴起后一跃而起，迁至炭儿胡同，亦工亦商，拥有工人一百数十人，由技工崔润甫、高济川担任设计，并由高济川及李之门婿杜少甫共同掌管业务，以高档白玉，翡翠等原料制做适合日本庄和美国庄的炉，瓶等素活，用珊瑚、白玉、碧玉、碧玺制做高级盆景和翡翠饰品，为磨制和经营洋庄摆件的先驱，其主要销售对象为日本经营古玩玉器的山中商会，以及浅野、福田等日本商家，与山中商会一次成交额折合当时黄金达数千两之巨，为清末民初声誉与规模最大的玉器作坊。但由兴至衰为期暂短，于二十年代初高济川离柜，李虽有五子，皆不务此业，挥霍无度，

后继无人而日益衰落以至倒闭。

玉成祥 侯仰山，出学于三聚成，二十年代在取灯胡同开设磨玉作坊，有技工六七十人，制做高级白玉，翡翠摆件，今著名玉器老艺人夏长馨曾为其担任设计，侯本人善于识别白玉，为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本市有名的玉器作坊之一，后因股东上海首屈一指的古玩商叶叔重撤股又乏有力继承者而歇业。

富华山房 李子泉，三聚成出师，制作素活摆件，产品浓厚雄伟，造型别具一格，李氏善于识别“子儿玉”的优劣，四十年代初，年老乏人继承而销声匿迹。

济兴成 高济川，回族，出学于瑞兴斋，为清末以来卓越的相玉师，1920年前后脱离瑞兴斋，在炭儿胡同开设济兴成玉器店，初期仅依靠义珍荣，宝珍斋，松宝斋等为之加工，后成立作坊，高氏精于对白玉的鉴别，尤善于对原料的分解取材利用，为南北同行所公认，以制做翠、玉素活为主要产品，其造型有其独特风格，颇负盛名，经营业务有韧性，故虽屡受国际变化影响，行业几经萧条，仍能支撑门面维持生计。解放后，又经政府的扶植，日趋发展。至1956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公私合营。高氏被安排为公私合营北京玉器厂的技术顾问。

聚宝斋 杜少甫，回族，出师于瑞兴斋，二十年代离柜在羊肉胡同开设玉器作坊，有工人四五十人，制作白玉素活和盆景。由于在瑞兴斋与山中商会交往密切，其产品销售大部仰仗山中商会收购，兴旺一时，芦沟桥事变后山中不再来华，由于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又无接班人而倒闭。

魁盛德 张自魁，设在羊肉胡同，约有工人四五十人，初以做绿晶原料为主，对绿晶制品颇有研究，此类产品较粗而价廉，别具风格，为国外市场所欢迎，后其师弟今玉行四怪之一老艺人何荣为其担任设计，则以制作松石，芙蓉石人物称著，1956年进入公私合营时仅有技工五，六人。

二、按照产品品种不同又分成下列不同的作坊：

1 摆件作坊 如前所述的几家典型。

2、烟嘴作坊 专门制做翠玉、岫岩旱烟嘴，在式样上分为“京样”与“馆样”两种，前者是供国内一般使用的，后者是专供蒙藏少数民族所用，由于这种蒙藏庄货品常在“外馆”进行交易故名，“馆样”的“脖儿”比“京样”的细，烟嘴的顶端（术语称之为“帽儿”）呈馒头形，而“京样”则是平顶，清代官宦富豪极为讲究使用以高绿翡翠制做的京样烟嘴，蒙藏少数民族则喜爱以高白玉磨制的尺寸较长的馆样烟嘴，价格甚高，贩者常以之交换大批牛羊及药材，是为蒙藏庄货品之一。此外尚有一种“线烟嘴”是供妇女使用的，“条口”（即粗细）比一般的要细一些。洋庄兴起后形成一种单独琢磨烟嘴的作坊，这类作坊由于资金所限，大部为经营蒙藏庄的商家如全兴盛，三盛兴等加工，岫玉烟嘴用料低廉，大部为“京样”，由于受到卷烟和外蒙古的变化，烟嘴产品已逐渐受到淘汰。

3、盆景作坊 用各种玉石磨制成梅花、牡丹、水仙、果树等不同种类的花瓣，花叶和果实组成各种花朵并攒组在“木本贴金”，“铜本留金”或“纸本”各类不同的树本花枝上，再装置在景泰兰、烧瓷、瓷盆或玉石盆内的盆景花树，过去做为宫廷陈设，民间婚礼

的嫁妆,后则成为国外畅销的洋装出口传统的工艺品之一。这类产品在制做过程中有二道不同的工序,一为按照花朵的不同,将各种不同颜色的原料磨制成形状不一的花瓣,花叶使之经过攒组后能以形成含苞、待放、盛开的各形花朵和有翻、卷、折、叠各种体态的花叶,这类工序称之为“磨活”。一为把磨制好的各形花瓣,花叶或果实经过攒组成为各种形态的花朵,花叶并攒组在各类不同的花枝树本上,成为一枝形态逼真,姿态俏丽的玉花玉树,再置于某一品类的花盆内成为成品,这类工序叫做“攒活”。两者均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艺术性,相互配备,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由于这两道工序在制做工艺过程方面迥然不同,一些小型作坊在经济上或技术上不具备其中某一工序的条件,随之形成了单一的“磨活”与“攒活”两种不同的作坊,攒组部份属于最后完工阶段,也就自然的形成销售者商业的范畴之内了。经营这类自产自销的商号如设在灯市口的润记经理徐润田。现代的“攒活”艺人蒋俊川、董瑞孚、张玉奇就是在润记学艺出师的,这类商家向小作坊、个体户购买或加工花瓣,花叶进行组装,因此在玉器行业里又有一种磨制花瓣花叶的小作坊,规模不大如二十年代下四条的王宝福作坊仅有工人十余人,清末民初设在羊肉胡同的三聚成则是既磨制又组装的全能作坊,规模较大约有技工三四十人。清末民初至三十年代中期玉树盆景销售颇畅,当时最负盛名的瑞兴斋,聚宝斋杜少甫等做摆件的作坊,也均以极佳的玉料制做高档盆景,尤以商家刘宜轩所设计的最为精美,他用优质的白玉,珊瑚,碧玺等做花朵,以赫赫有名的“刘四碧玉”为叶制作形态逼真的高级盆景,售价高昂。

4、花片作坊 以各种原料磨制的花片是洋庄出口饰品之一,在设计图案和制做工艺上具有其独特技艺,清末开设在上四条的聚古斋是专门磨制高级翡翠花片的作坊,这种花片适销于日本,三十年代的德丰号是制做红玛瑙花片的作坊,花片包括别子(即珮),坠子等等(待续)。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萧 劳

蔡元培校长一事

一九一七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当时我的名字是萧稟原。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时我是一个学生,和蔡先生接触不多,但有件小事使我深深领略到了蔡先生的教育家风度。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处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再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陈独秀学长二事

陈独秀先生那时任文科学长,不仅是提倡新思想、新文学的一位领导人物,而且对文科教学工作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两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

我考入北大中国文学门后,上英文课,当时英文教学按试卷分教编成甲乙丙丁戊五班,我被编到乙班。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个中国字不说。我是在河南省立二中学的英文,虽然文法清楚,英文字认得也不少,但听力不行,对英国教授讲课一点也听不懂,便不去上课了。过了一个星期,陈独秀突然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你为什么不去上英文课?”我说:“听不懂。”陈先生说:“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绩很好,怎么会听不懂呢?”我说:“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只能写,不能说。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说得太快,我听不懂。”陈先生便说:“那你就退到丙班吧,还听中国老师讲课。”后来我就在丙班上課了。

中国文学门是由黄侃先生讲授古文。第一天上課就出了个《文心雕龙》上的题目,叫学生作文。我刚写了一百多字,黄先生看见了说:“好!”便拿到讲台上念了一遍。有一天下午上课,我精神有点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看见后勃然大怒说:“我

讲书，你困觉！”我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先生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我一负气就出去了，接连两个星期没上黄先生的课。又是陈独秀学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了，问我为什么不上课。我陈述了以上情况。陈先生说：“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呢？”我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先生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送进教室，正好黄先生在讲课。陈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黄先生也没有说话，陈先生才离开教室。从此我就恢复上古文课了。

钱玄同先生一事

钱玄同先生那时讲授文字音韵学。他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很受同学尊敬。有一次，钱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广东音韵，课后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提出了不同意见。下一次上课时，钱先生上台后面带笑容，客气地问：“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李锡予站起来回答说：“我就是。”钱先生说：“请坐！我见到你的信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钱先生在课堂读了李锡予同学的信，还希望其它同学对讲课中纰漏之处提出意见。从这件小事，可见钱先生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

黄侃先生三事

黄侃先生当时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龙》，他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他是“国故派”的一位首领，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有一次他过生日，几位中国文学门的学生登门拜寿，其中有位陈莲痕同学是我的好友。他们进门后行了三鞠躬礼。不料黄先生勃然大怒，说：“我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给太炎先生拜寿都是磕头。你们却鞠躬？！”当时吓得这几位同学只好磕头。

黄先生最喜爱的一位学生叫郑奠，常常给黄侃先生拿皮包。后来郑奠毕业了也在北大任教。有一天，黄节先生（北大讲授诗词的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先生和郑奠二人都去了。黄侃先生看见郑奠穿着一件皮袍，大为不悦，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郑奠说：“我穿我的皮袍，你管不着我。”黄侃先生听了很生气，从此不理郑奠了。

黄侃先生的脾气古怪，他本来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不知什么缘故和这位朋友闹翻了，搬走的时候，用毛笔蘸浓墨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带鬼字旁的大字。众人看见满壁皆“鬼”，黄先生才得意而去。

罗家伦二事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个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他追逐名利权势，当时就为同学所不齿。我记得“五四”游行后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礼堂的学生集会上，罗家伦大肆吹嘘自己，引起与会同学不满，说他“沽名钓誉”、“风头主义”。一位同学就走上去把他推下了讲台。罗家伦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却暗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

崇文区知名老字号（三篇）

王永斌

正明斋饽饽铺，通三益干果海味店，便宜坊烤鸭店是过去闻名北京四九城的老字号。正明斋的满汉糕点，通三益的秋梨膏都曾和清宫有过瓜葛。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是烤鸭业的正宗，用焖炉烤出的鸭子，色、香、味俱佳。这三家老字号都在我区，现把它合在一起，奉献给读者。

这三篇文章都曾在《驰名京华的老字号》一书中发表。发表时，《正明斋饽饽铺》一文，是笔者访问该店前经理张蕴芳后，整理而成的。《便宜坊焖炉烤鸭店》用的是笔名。特说明。

通三益及其著名的秋梨膏

为了向读者介绍通三益这家北京的老店，笔者走访了崇文区鲜鱼口基层副食商店的郭维藩师傅、北京义华食品厂的牛师傅，以及该店职工褚、白二位师傅。他们向笔者介绍了很多材料，现整理如下。

通三益的创始

通三益坐落于前门大街五牌楼迤南马路东侧，它是北京一家久负盛名的有着三间门脸的干果海味老字号，创始于清朝嘉庆二十年（公元一八一五年），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的历史。这家商号现在销售的青松秋梨膏（原名醉翁秋梨膏），系该店按照清朝宫廷秘方自制而成，清末民初时期曾远销外国，驰名中外。

通三益是怎样创办的，创业者又是谁呢？

加段琪瑞的宴会。有些北大同学得知此事，画了一幅罗在宴会上拿着刀叉吃大菜（西餐）的像，加了注解，贴在北大西斋壁报栏上。同学们看了都很气愤。有位同学写了四句打油诗讽刺罗：“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意指无耻）。”这四句打油诗在北大广传一时。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徐康 整理